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获奖者面面观

他们,有的是“70后”“80后”作家,有的是文坛“常青树”“熟面孔”,还有仍在承继我们这个诗歌王国古老传统的当代诗人们。在9月20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

在这个时间已变得碎片化的时代,是否还能静下心来写作?在这个喧嚣的社会里,怎样聆听内心深处的声音?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些获奖者们,看看在当代,文学何为?



“70后”“80后”青年作家： 用更诚恳的精神回馈传统和时代

“70后”北京作家石一枫,以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获奖。该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北漂”女孩的奋斗、挣扎、追求以及梦想幻灭的故事。

在石一枫看来,在诸多写作传统之中,他更希望自己有能力去继承的,是发祥于100余年前,被称为“新文学”的那个传统。他认为,当代中国的变化改造着中国人的生活,也使得文学写作有可能成为一项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工作。“我深感自己必须拿出更真挚的态度、更诚恳的精神,才能回馈我们的传统与时代。”石一枫说。

与来自大城市的石一枫不同,“80后”马金莲来自遥远的西海固,那里曾被称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18岁开始“发自真心喜欢”写作的她,凭借短篇小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获奖。小说以两种家常食物的制作和分享,晕染了生活之美。

马金莲说,十几年的写作生涯里,她坚持用最朴素的文字表达着西部乡村最底层广大普通人的生存和生活图景,构建诗意栖居的乡村生活画面。“书写是一种幸福,我希望自己的一生是和文学始终相伴的一生。”她动情地说。

文坛“常青树”“熟面孔”： 对文学创作常存敬畏之心

冯骥才,久负盛名的文坛“常青

树”;阿来,文学界熟悉和认可的“熟面孔”。这些作家们,虽然成名已久,但仍用雄健的笔力,探索着文学创作的种种可能。

冯骥才的获奖作品《俗世奇人》(足本),是首部赢得鲁迅文学奖的小小说作品。该作品回到传奇志异的小说传统,回到地方性知识和风俗,于奇人异事中见出意趣情怀,标出志小小说创作的“绝句”境界。

冯骥才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投身濒危的文化遗产抢救中,渐渐放下了一己的文学写作,直到2013年年过七十,才又开始进行文学创作。

“我对文学和文字始终是敬畏的,它不能亵渎,不能戏弄,它是一种苦苦的追求与探索。”这位老作家在谈到文学时,满是发自内心的执着和认真。

曾获得过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阿来,这次以中篇小说《蘑菇圈》获奖。小说讲述了阿妈斯姆珍藏、守护着她的蘑菇圈,召唤着人们与世界相亲相敬的故事。

“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就像我的主人公所守护的生生不息的蘑菇圈。”阿来说。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获奖的作家既有文坛的“常青树”“熟面孔”,又有“70后”“80后”青年作家,这样的获奖结构,显示出当下文学队伍的不断壮大,也体现出文学创作代代相继的良好态势。

诗歌国度的吟唱者们： 张开敏锐机警的语言触角

在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里,有一类文学体裁因其历史悠久而著称,那就是诗歌。它所传承的,正是我们这个古老的诗歌国度生生不息的语言传统。

来自安徽的诗人陈先发,以其诗集《九章》而获奖。这本诗集具有结构上的整体性,在浓郁的现代感性中融合了格物致知的古典眼光,带给读者思辨之力、遨游之感。

在陈先发看来,无论是在相对隔绝的农耕时代,还是在信息过度堆积的今天,无论是哪一种体裁的写作,保持一颗游于万物的心真正地写作,都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忠实真诚的写作勇气才会到来,敏锐机警的语言触角才会张开。”他说。

女诗人杜涯,以作品《落日与朝霞》获得诗歌奖。在这部作品里,她探索了心灵与自然、生命与万物之间的微妙关联所构成的广袤的“生活的银河系”。

她说,30多年来,诗歌在心情低沉时给她温暖和力量,在生命灰暗时让她看到光明和希望。“诗歌必须是纯正、向上的,必须是高贵、高尚的,这乃是诗歌的本原。”杜涯说。

“让澎湃的现实生活、让昂扬的时代精神、让丰盛的经验 and 情感在作家笔下提炼造型。”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表示,在这伟大的新时代,文学海阔天空的可能性正在我们眼前展开。

(新华社)

开江五金工具 的辉煌与没落

- 羊角锤等曾是四川省第一批出口产品
- 远销欧美、中东、东南亚、港澳台等30多个国家与地区

□林佐成

开江五金厂曾创造了历史的辉煌,其生产的羊角锤等五金产品远销国外,让开江人引以为傲。

开江五金的发展,要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当时,城普一带小作坊生产的刀具、刨、凿、镰刀、剪刀等小型用具,因质量好、价格低,远销湖北的房县及万县、梁平,黎家老菜刀更是远近闻名。抗战中,城普小作坊开始仿制“七七”纺纱机,木滚筒铁皮脚踏弹花机,机械生产的雏形开始形成。

开江解放后,小作坊小响应的号召,先后成立了铁器加工组、农具生产小组、五金社等。当时的五金社,拥有三大烘炉,采用原始的拉风箱办法,生产菜刀和剪刀。尽管方法陈旧,但三个技艺精湛的老铁匠黎水苏、李锐生、文辉信,还是将沉寂多年的老牌子——黎家老菜刀,锻造得风生水起。

到上世纪60年代,县上开始组建国营五金厂,扩大生产规模,先后招进五六十名学徒,其中包括女学徒。这些女学徒的主要工作是拉风箱,因为活路轻,人们都戏称她们为“箱干部”。尽管拉风箱活路轻,看似很随意,其实来不得半点疏忽,风箱拉轻拉重,直接关系到火力的大小,关系到菜刀的成色。因而,女学徒们拉得小心又专注。此时,五金厂依然以生产菜刀、剪刀为主。

“文革”结束后,县上抽调年轻力壮的蔡祖富、孙仁青等进入五金厂。这些新生力量的加入,为五金厂的发展增添了活力。他们已不满足于打菜刀打剪刀,开始谋求更大的发展,试着用手工生产羊角锤。只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批给他们的钢材少得可怜,厂里每天只能生产几把羊角锤,然后拿到县五金公司售卖,但销路却出奇好,大家竞相购买。厂里的领导看到了希望,他们寻思着扩大产量和销量。此时,四川还没有进出口口岸,一个远在广州工作的老乡帮了大忙,他把开江的羊角锤介绍到广交会。于是,五金厂的领导远赴广东、上海,联系广东机械进出口公司、上海机械进出口公司,甚至中国进出口机械总公司。由此,以羊角锤为主的五金产品,开始出口到东南亚等地,羊角锤等也因此成为四川省第一批出国门的产品。

开江的羊角锤,质量过硬。厂里生产羊角锤,从来都是按标准执行,从不偷工减料。他们选用的钢材必须是45号钢,锤头则根据外国人的体重设计;即使手柄也毫不含糊,全用青枫木制作。那时为了制作手柄,他们会曾多次找到林业局、农业局要指标。由此,即使高空作业,羊角锤不幸掉下来,它的角不折,把手不断。同时,羊角锤用途广,既可扎钉子、拔钉子,还可用来敲打等,因而广受东南亚国家的青睐。

五金厂抓住契机,扩大生产规模,除将已有的羊角锤等五金产品出口到东南亚等地,还根据对方需要,生产六四型的羊角

锤。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五金厂的五金出口达到高峰,为国家赚取了不少外汇。机电部为了鼓励他们出口,对羊角锤等五金产品出口后,返还一定额度的钢材,这种做法,极大地缓解了五金厂原材料的欠缺,也促进了羊角锤的生产与出口。只是那时的开江人没有商标意识,一直没有注册,后来虽然注册了一个“川宁”商标,可惜五金厂已开始走向了末路。

由于五金人的努力,开江小五金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曾经,五金厂年产羊角锤180万件、老虎钳及桌虎钳40万台、锯架50万台、旋具200万支……五金产品达26个品种,225个规格,其中,“双虎”羊角锤、“七八〇五〇”、“七八〇六五”桌虎钳,获部优称号,圆锥形羊角锤等9个产品获省优产品。它们曾远销欧美、中东、东南亚、港澳台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创了自力更生、勇闯市场、团结奋进的“五金人精神”。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打开羊角锤等五金产品的销售市场,五金厂的许多销售员成天奔跑在全国各地,一个月几乎要走烂一双鞋子。曾经有一个推销员,因为偷偷将一箱羊角锤背上火车,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结果被乘务员发现,要称斤,居然有120斤。曾经经常跑采购的帅师敏告诉笔者,他那时在外地搞推销,一年365天,出差竟然高达316天。常常他一回来包还没放好,厂里又通知他外出。他甚至来不及在家吃上一口热饭,又背着包挎着箱,出门赶汽车火车去了。

至于后来,他们徒手搬运压力机,更是传为佳话。五金厂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购买了一台400吨的压力机。压力机运回到厂门口,没有吊车,没有其它大型搬运工具,如何将它安放到生产线成了难题。五金人没有退缩,蔡祖富当即组织青年突击队,八十多个年轻小伙子就像八十多只蚂蚁,密密麻麻地布满压力机,他们推的推、拉的拉,凭着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将压力机拉了近50米,然后安放到位。后来,棉纺织厂购买大型机器设备,拉回来后,都找五金厂的青年突击队搬运,他们不讲价钱,却干得热火朝天。

也许正是五金人自力更生团结奋进的精神,才开创了开江五金厂过去的辉煌。

时移世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江浙小五金的兴起,加上五金厂没能及时注入新鲜血液,缺人才、缺技术,加之后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体制问题,曾经显赫一时的五金厂,终于走向了没落。



杨吉林:12岁参加红军

□本报记者 罗天琪/整理

杨吉林出生于1921年10月,是万源市太平镇北马鞍山人。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经“宣达战役”解放万源,12岁的杨吉林参加了红军,在第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二连当勤务员。他爱蹦蹦跳跳,表演能力强,1934年调任三十六团政治处剧团文工团员,参加万源保卫战,与团员一道前往大面山战场慰问演出。1935年调任十师政治部剧团文工团员、特务员,为接应中央红军长征,随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进军川西北。8月,杨吉林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与大型文艺演出,热烈欢迎红一方面军。接着,随军征战川南,与全军将士一起,在

百丈关演出,战斗七天七夜。

1936年,杨吉林到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任警卫员,表现诚实、机灵,颇得领导赏识,后任通讯班长。1938年2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杨吉林酷爱学习,1940年调三旅为教导队学员,同年任三旅政治部支部书记。1941年至1942年,先后任政工连、工兵连、骑兵连指导员。因工作出色,1942年调任鲁西军区机要科机要员,鲁西军区与冀南军区合并为冀鲁豫军区后为机要科核心组营级机要员。1944年至1946年初,提任军区第三科科长。抗战期间,先后历经青南湾、平汉、鲁西南等重大战役战斗。

1950年杨吉林调任二野司令部机要处协理员,接着,部队入藏,任司令部机要处处长,参与解放西藏的工作和斗争。

1952年调川南军区任副处长、处长。不久,四川四个军区合并为四川省军区,任省军区机要处处长。同年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三兵团机要处处长、兵团直属机关党委委员,1954年调任志愿军总部机要处副处长。战争胜利后,荣获抗美援朝纪念章。1958年调任南京军区机要处任副处长、处长、军区司令部党委委员、军区直属队党委委员。1961年,改任南京军区机要局局长。1970年,调任浙江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其间,曾当选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1年任军区顾问,2011年3月在杭州病逝。在军事生涯中,他在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文必达: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

□本报记者 罗天琪/整理

文必达,1907年出生于渠县岩峰镇山花村文家山,8岁入私塾,后转入国民小学,1921年考入县立中学就读。

求学中,见军阀混战不休,豪绅巨贾巧取豪夺,家乡父老身受涂炭之苦,文必达痛心疾首,愤愤不平。1926年夏,文必达考入成都立法政专门学校,攻读经济专业,刻苦用功,立志报国。他与中共党员王道文、晏云阶等探索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在中共成都市委领导龚堪慎引导下,阅读《唯物史观浅释》《共产主义ABC》《中国青年》和《响导》等革命书刊。不久,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军阀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军联合办事处在成都制造了震惊全川的“二一六”血案,王道文等14人惨遭杀害。文必达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在揭露“二一六”惨案真相大会

上,登台控诉,义正词严,支持国立成都大学师生向国民党成都市党部发出质问信,参与挽留张澜校长复职的请愿活动。为此,他被成都当局列入黑名单,被迫偕妻返回故里。

回乡后,文必达到岩峰女子小学和男校任教,教育学生循循善诱,启发勤思,对违规逾矩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备受师生敬仰。文必达等共产党员集于岩峰男、女小学,组织“革命行动社”,设阅览室,指导青年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达尔文》等书刊,开展读书会、故事会、谈话会等活动,使一些进步青年参加红军及党的组织,投入革命斗争。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共岩峰特支决定组织一营武装,命名为“营渠工农大同盟”。文必达参与组建武装,并任第一连连长,配合红军行动。1934年1月,红军撤离渠县,川军二十军第四混成旅旅

长杨汉斌率部复据渠县。军匪官吏、土豪劣绅大肆反攻倒算,还乡团悬赏通缉文必达,抄其家产房屋。大兴团总石照初率民团一个班缉拿文必达夫妇。

文必达身陷囹圄20余日,首次被审,他抢先质问:“我妻非娼非盗,何罪之有?”当局无言以对,只好当堂放人。他叮嘱妻:“定要教育好孩子,要有骨气。我为革命流血,死而无怨。”

1934年1月26日清晨,狱卒献上酒饭。文必达见了说:“腥臭酒饭不能玷污我的清白。”刽子手剥光文必达上衣,将其五花大绑,押解岩峰场火亭子操场,绑于木桩上,他大义凛然,面不改色。文必达就义时年仅27岁。



7
版

文史·艺境

达州日报

生活

周刊

主编:蒲建国
编辑:王梅

2018年10月12日 星期五
dzbshtk@126.com 2877721